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八六）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五四期 ——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7a）

【往事非烟】	北京四中的“文革”见证——《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背后的故事	颜 亮·陈晓勤
【史海钩沉】	陶铸是被谁打倒的	阎长贵
【读书笔记】	知青——自我安慰的“青春无悔”	谢轶群
【文艺评论】	赞美苦难是一种虚妄	景凯旋
【宦海沉浮】	为何“打倒胡乔木”大字报却救了胡乔木	丁晓平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往事非烟】

北京四中的“文革”见证
——《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背后的故事

• 颜 亮·陈晓勤 •

3月，《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以下简称《暴风雨的记忆》）在内地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北京四中的回忆文字结集，十八位作者都曾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属于“老三届”，即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

曹一凡、北岛、维一三人任此书主编。北岛是核心。

在书的序言中，北岛写道，“北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曾处在暴风雨的中心，在这小小的舞台上，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

就在这个舞台上，高干子弟、知识精英、平民子弟被推拉上阵，大幕拉开，剧情浓缩了一个中国。

这本书中的文字，真切记录了“文革”暴风雨怎样冲刷一代人的心灵，又如何影响他们的一生和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未来。

“暴风雨过去了，如果什么记忆都没留下，我们不仅愧对自己，也愧对我们的后代——所以才有了这本书。”北岛写道。

1、风暴眼

由于高干子弟云集，内部消息灵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心。

1965年夏天，16岁的北岛考上北京四中高中部。在《北京四中》一文中，他形容自己是“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让他更惊喜的是，同住一栋楼的“发小”曹一凡也考进了北京四中。两人都在高一（五）班。

四中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学校之一。“我1964年考入四中初中，当时北京城区的男校，没有比四中分更高的了。”本书作者之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印红标说。

北京四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离长安街很近，正门不远是西什库教堂，后门对面便是林彪的住所。四中以拥有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而闻名。“在男校里四中考分要求最高，西城区是国务院各大机关和家属集中的地方，所以四中有很多国务院各大部的子弟。”印红标告诉南都记者。

“文化大革命”前夕，四中云集的子弟包括“一二三”，刘少奇的儿子一个（刘源源），彭真的儿子两个（傅洋、傅亮），薄一波的儿子三个（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再如像谢富治的儿子，谢觉哉的儿子，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都在北京四中，将军级的子弟就更多了。

“大部分人都是凭真本事考进去的。”曹一凡说，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北京四中念完初中后，没能考上四中的高中。虽然陈毅时常去北京四中，但陈小鲁最后还是不得不去了北京八中。

表面看来，当时的北京四中学风正派、欣欣向荣。

但在“文革”爆发前，“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显然有什么东西被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北岛写道。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爆发，四中停课，北岛、曹一凡以及整个“老三届”瞬间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当时，北岛和曹一凡同属于北京四中的“造反派”。

由于高干子弟云集，内部消息灵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心。

1969年，北岛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工人；1971年，曹一凡被分配到西城碳素厂做烧火工。此后，两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北岛成了知名诗人、作家，曹一凡则成了成功的商人。

2001年，北岛回到阔别十三年的北京。北京的剧变让他震惊，“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

乡人。”北岛在《城门开》的序言中感叹道。

记忆中的北京四中也早已消失。1986年，北京四中校舍全部翻建。面对这个白色现代建筑群，“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也没有，茫然摇摇头。”北岛写道。“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生，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与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城市一起消失了。”

北岛决意用文字来重建自己的北京城，由此开始了《城门开》系列文章的写作。写作过程中曹一凡惊人的记忆力为北岛写作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尤其在《北京四中》一章中。

2009年10月，曹一凡到香港探望北岛，再次聊起北京四中的往事。“记忆那么好，历史那么独特，应该编一本书。”北岛建议曹一凡可以和维一（黄其煦）合作，编一本关于北京四中“文革”的回忆录。维一是北京四中1966届初三（一）班学生，与曹一凡是多年的朋友，去年出版了《我在故宫看大门》一书。

“我对四中的印象特别深，一直想给学校留点什么。”曹一凡说，正是在四中的那三年，让他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他接受了北岛的建议，并为此四处联系。

由于联系出版社、编辑稿件等原因，北岛最终参与进来。“这恐怕也和我编《七十年代》有关。”北岛说。

《七十年代》是由北岛和李陀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回忆“七十年代”的文集。收录了阿城、朱正琳、陈丹青、北岛、张抗抗在内的三十篇记忆文字。“如果追溯历史，势必要从七十年代推向六十年代，必须要到‘文革’的暴风雨中寻找答案。”北岛说。

2009年11月29日，维一回复曹一凡，同意参加《暴风雨的记忆》一书的编撰。

曹一凡在北京，负责约稿及收集图片；北岛在香港，负责文字编辑；维一在美国，负责协调和编校。

在约稿前，北岛确定了稿件编辑原则。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尽可能保持客观立场，要能把完全对立的声音汇集起来。”北岛说，为了尽量容纳当年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他们特别选取了当年具有代表性或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兼顾不同类型的角色。“重要的是通过个人的视角、感受、情绪等细节，去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可感性，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那些历史事件和场景。”

“老兵派”、“造反派”，悉数登场。

2、各派别

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要想把各个派别，各种人的观点都反映出来，并不容易。”曹一凡说，当时北京四中有两大派别：“老兵派”和“造反派”。“老兵派”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造反派”主要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算是“文革”中的激进派。

北岛和曹一凡都属于“造反派”，同其他“造反派”都还有些联系。问题在于“老兵派”，虽然“文革”中他们也倒台了，但由于生活经历和环境的差异，他们同别人并不交融，彼此也没什么往来。

曹一凡最先找的是刘辉宣，他们是高一（五）班的同学。

刘辉宣是北京四中“老兵派”的代表人物。他1965年考入北京四中，“文革”中广为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正是由他谱的曲。

口号喊出来非常偶然。“当时，我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也没有涉及出身问题。但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先声夺人，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刘辉宣在《昨夜星辰昨夜风》一文中回忆道。

这首鼓吹“血统论”的歌迅速传播全国，成为红卫兵的“战歌”。反对之声也如约而至。为评判这首歌，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因此入狱，最终被枪决。

“血统论”后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判，刘辉宣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各路红卫兵都追着他打，争相批斗。巨大的恐惧让他做好了随时被枪决的准备，有段时间，每天都在家里练习“慷慨就义”。

刘辉宣答应了曹一凡的约稿，但不是给他写，而是将两篇访谈录给了曹一凡。一篇是讲西城纠察队，也就是“老兵派”的事；另一篇谈高一（五）班的事。北岛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摘取一些内容，做了大量的改写，最终成文。

“我觉得很自然，只要是有人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管是对‘文革’还是对我感兴趣，我都会说给他听。”对于“文革”期间的事，刘辉宣早已释怀。而遇罗克之死，刘辉宣认为与《出身论》并无关系，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的态度是先看事实，动机都是次要的。完了以后，就说我们影响到什么程度。如果不重要，那就过去了；如果很重要的话，那承担嘛。”刘辉宣说。

之后，北岛和曹一凡又争取到高三（五）班红卫兵的头儿、教师劳改队队长刘东和“老兵派”领袖秦晓的参与。最终在《暴风雨的记忆》中，共收录了三篇“老兵派”的回忆文章。

除了“老兵派”和“造反派”以外，北京四中还有一些人什么派别也没参加。影响较大的有赵京兴。

赵京兴是六六届北京四中初三（三）班的学生。赵京生的父亲是个裁缝，家庭条件比较差。这种家庭背景在四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赵京兴是个真英雄。是个跨了时代的人，又有胆，比我们看得不知道远多少。”曹一凡说。

1967年初，赵京兴在《中学文革报》上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非常赞成。当时还和同班同学组成“红旗”战斗队，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学文革报》。

在一次同“老兵派”的辩论中，赵京兴引起遇罗克的注意。遇罗克给赵写信，此后频繁来

往，直到两人入狱。

“我当时就认为，《出身论》只是个简单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当然不会像血型那样是可以遗传的。若无‘血统论’，它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那么多人摇旗呐喊，更用不着遇罗克献出生命。但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触动的实际是某些人感情背后的权力与利益。”赵京兴在文章中回忆道。

1968年底到1969年初，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发布后不久，赵京兴便写了“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的大字报，申明自己不上山下乡的理由，他认为当时的政策歪曲了毛泽东的指示，纯粹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自己的志向是从事理论研究，通过其他方式同样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大字报发表之后，赵京兴很快被“工宣队”隔离审查。

真正让赵京兴获得牢狱之灾的，是《哲学评判》。这是赵京兴送给女友陶洛诵的生日礼物。在这篇“不到十万字的论文”中，赵京兴阐述了自己对哲学的独立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命题。当时，赵京兴只有十八岁。

1970年，赵京兴被西城区公安局逮捕。此后每次政治活动，赵京兴都会成为活靶子，什么罪名都往他头上安。

“我之所以答应写文章，也是希望澄清事实。”赵京兴告诉南都记者，他同遇罗克的关系一直都有误传，《哲学评判》一直也有传闻，甚至被人叫做《历史哲学》。他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有所订正。“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事实是怎么回事，尽可能在篇幅内表现出来。”赵京兴说。

“不需要怎么说服，参与者对书的意义都是基本认同的。”北岛和曹一凡当时找了五六十个当年北京四中的“老三届”，大部分人的稿子都交过来了。经过北岛长达半年时间的编辑和梳理，最终确定了目前十八个人、十八篇文章的基本格局。

十八个人分别是：牟志京、刘辉宣、陈凯歌、周孝正、秦晓、杨百朋、刘东、冯永光、王祖镠、赵振开（北岛）、印红标、李宝臣、黄其煦（维一）、赵京兴、白羽、高中、唐晓峰和曹一凡。

曹一凡当时还想找在“文革”中出身不好（地富反坏右）的同学也来写。他们在“文革”前就被打倒，“文革”中也挨了不少打。但没有一个人答应。“这也正常，当年挨打的同学，现在也是大学教授，你说他还愿意出来写他那段吗？”

3、写历史

要抢救历史，应该提倡大家动笔做起，而不是依赖几个名人靠不住的回忆。

北岛希望当事人不带任何评价地回忆过去。

“现在还不是反思‘文革’的时间。”北岛说，“文化大革命”非常复杂，应该趁当事人记忆力还好，记录下当时人的视角、感受、情绪、立场等细节，通过细节来回复历史原貌。只有等“文革”资料丰富了才能反思，否则会破坏当时的现场感。

“如果连历史背景与脉络、派系背后的利益冲突、革命话语及斗争方式、个人本能的压抑与释放等都没搞清楚，‘反思’从何谈起呢？”北岛说。

细节比对带来差异。在《暴风雨的记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刘辉宣究竟有没有打过牟志京一事。

牟志京是六七届北京四中高二（二）班的学生。他曾激烈地反对“血统”论，并创办了《中学文革报》。

在回忆文章《似水流年》中，牟志京详细回忆了他在北京四中被刘辉宣打松一颗门牙的经历。

当时，牟志京带朋友赵颐庚去宿舍。宿舍里有人问赵是什么出身，赵不愿回答。很快就冲进七八个手持武装带的红卫兵，问是哪一个。

“为首的那人方脸盘，个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上去就给了（赵）一拳。我见状便朝那大手喝道：‘你凭什么打人？’他转身朝我走来，站在我跟前，上下打量着我说，‘看你蛮会打架的样子，不过，老子不怕你。’话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脸上挥来……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写歌的刘辉宣”。牟志京写道。

刘辉宣的回忆文章《昨夜星辰昨夜风》中，坦诚自己曾打过“牛鬼蛇神”和流氓，并没有提到打同学的事。

“我打过不少人，还真是没打过同学，我当时也不认识牟志京。”刘辉宣对南都记者说，曹一凡曾把牟志京的文章发给他看。“看完之后，我就说了两点：第一，没这事，真没这事；第二，你还是把原样给登出来”。

“当时在学校开我的‘批斗会’，我有一个策略，一上台就给自己安一个罪名，说我打过人，向同学们请罪。”刘辉宣估摸着牟志京就这样给弄混了，“他可能被外班的打过，我又冒出来承认自己打过人，这事在他心里就挂上了”。

为什么不把事情说清楚，还让照登呢？

“第一，牟志京‘文革’时挨过揍；第二，我‘文革’时揍过人，这不就完了。这个理在这儿，具体这个事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能说明牟志京没挨过打吗？能说明我没有打过人吗？我们有过这行为，那就有这责任，我让他一定要登出来，就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刘辉宣对南都记者说。

北岛乐见这样的比对。“根本不存在所谓历史的客观。人的记忆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和排他性。你把不同的回忆放在一起，远比重易下定论或空谈‘反思’更有意思。”他说。

“要抢救历史，应该提倡大家动笔做起，而不是依赖几个名人靠不住的回忆。”维一告诉南都记者，过去的回忆录，仅为名人专利，使历史被强势群体霸占，这样的历史往往一面倒，且大多是不真实的。

“历史是一个完整全面的实体，不会因人的观察而改变。但人的观察却会因为心中的壁垒而改变历史映射出的色彩和形状。”维一说。

同一件事，不同当事人的观察，在书中也得到强调。最明显的是赵京兴和白羽的例子。

白羽是北京四中70届的学生，已经超出“老三届”的范畴。但最终还是把他加了进来，因为他在“牛棚”看守过赵京兴。“把他们俩儿的回忆一比对，那就非常完整了。”曹一凡说。

在白羽看管赵京兴的回忆中，提到一个细节：“我经常向赵京兴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则欣然指点，侃侃而言，让我受益匪浅。有时批斗回来，赵京兴会告诉我今天批判稿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应该怎样批才深刻，我简直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批判他的发言稿的”。

“这种事，你是根本没法编出来的，都是活生生的事。也正是这样的细节一点点汇成了现在这本书。”曹一凡说。

书出来后，“老兵派”的强烈反应倒让曹一凡有些意外。

“‘老兵派’对普通人的生活，对他们迫害过人的生活并不了解。”曹一凡说，他们没想到“造反派”其实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自己的爱情，有自己的善良，有自己的追求，都是阳光的。“他们发现，当时平民子弟关心的事情，当时的追求，其实并不比他们差”。

“之前只知道，‘老兵派’带着原始股来，一直在压迫我们。”曹一凡说，现在也开始看到了人的另一面。当时大家追求的很多东西，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想革命，都有共产主义理想，只是每个人具体走的路可能不一样而已，“说白了，大家都是个悲剧”。

即便如此，从当年到现在，“老兵派”同“造反派”间的隔阂，并没有因了解而稍有减弱。

“也不可能减弱，这和权力的远近有关。”印红标说，为什么“西纠”有权威性，完全是因为他们是中国最高级干部的子弟；中学“造反派”之所以要造反，也是因为他们对权力不满，要评判权力，批评出身。

离开北京四中后，经历暴风雨后的同学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刘辉宣，1969年离开北京四中，随即入伍。1980年，他以礼平的笔名发表了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深刻反思“文革”和红卫兵运动，主张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引起文坛的争议与批评。刘辉宣因此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2008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秦晓，1968年离开北京四中，在内蒙牧区插队。改革开放后，曾任宋任穷的秘书，后进入中信集团任总经理，之后又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现在是博源基金会董事长。

赵京兴，1969年入狱，1972年出狱后，先是做临时工，1975年在北京市一轻局工程处当工人。1972年，赵京兴的阅读兴趣从哲学转向经济学，1980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1986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印红标，1968年离开北京四中，到北京市门头沟煤矿做工。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

本科，1982年在中央团校任教，1984年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附：名词解说

北京四中——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校史。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为北京第四中学。2005年与北海中学合并，恢复初中招生。校门是灰砖和石块构筑的牌坊式建筑，带有清末民初的风格，校名由郭沫若题写。四中的著名校友，包括陈凯歌、北岛、孔丹、秦晓等。

废除高考——1966年6月，四中高三（五）班的学生响应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倡议，以“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名义，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委托四中学生刘源（刘少奇之子）将倡议和信呈交毛泽东。他们可能事先获知中央希望展缓高考的消息。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改革高校招生办法的决定，以及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给毛泽东的信、北京四中师生的倡议书和高三（五）班给毛泽东的信。高考直至1978年才恢复。

“鬼见愁”歌曲——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高潮中，高一（五）班班长刘辉宣谱曲的对联歌，成了“文革”广为流传的歌曲，此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人称“鬼见愁”歌，是流行的红卫兵歌曲之一。

“西纠”——1966年8—9月，北京的一些中学红卫兵组织发起成立“红卫兵纠察队”，当中最早成立、最有威信的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主要负责人有孔丹、秦晓、陈小鲁（陈毅之子）。周恩来认同其做法。“西纠”根据他们对中央政策的理解，规范红卫兵活动，包括制止打人等暴力行动。但“西纠”也存在打人现象。同年11月，“西纠”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判，停止活动，主要负责人被批判，甚至关押。

《中学文革报》——“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铺天盖地，当中最热销、最具影响的莫过于《中学文革报》。由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与遇罗文于1967年1月18日创办，截至同年4月共刊出六期，总印数达30万份。该报创刊号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遇罗克随后还发表《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等，影响很大。此报后被戚本禹称为“大毒草”，被迫停刊。

“新四中公社”——从1966年10月起，“老兵派”逐渐被北京中学造反派取代。翌年春，由于中央首长4月3日和4月4日的两个讲话，形成“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的社会构成以平民子弟特别是知识分子子女为主，“四四派”以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为主。四中校内的造反派成立“新四中公社”，属温和的“四三派”，四中绝大部分学生都加入在内。他们发表《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打碎特权阶层”，有理性的政治、社会诉求。

□ 原载《南方都市报》

~~~~~  
【史海钩沉】

陶铸是被谁打倒的

• 阎长贵 •



陶铸，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他从中南局第一书记的位置上调中央（陶铸1965年1月已任国务院副总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6月1日离穗北上，4日抵京。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1名常委中排名第四，除了毛泽东、林彪之外，仅次于周恩来，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可谓位高权重。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四个多月，到1967年1月4日就被江青、陈伯达等公开点名打倒了。从此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为什么打倒陶铸？又究竟是怎样打倒的？这件事情迄今已经过去45年多了，似乎还没有文章和书籍（和中央文件）完全说清楚，留有重大的“谜”。我不揣冒昧，拟就自己所知所闻谈谈这个问题。

## 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针对谁

首先，在怎样搞文革的问题上，陶铸和毛发生了分歧。

我们知道，1966年10月1日毛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大力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这主要是针对谁？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吗？这个概念提出是由刘少奇的事引起的没问题，但主要针对谁，却是需要动脑筋思考了。要知道，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就基本靠边站了。刘少奇在回答戚本禹1967年4月1日发表的《卖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中的“八个为什么”时明确地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见，刘少奇非常清楚地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指他（虽然如上所说，由他而起）。那是指谁呢？应该说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抵制，而从中央来说，我觉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得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见《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页）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内容就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毛用这个问题作为反对刘少奇的口实，恐怕是一个“诱饵”、一个“套”，刘少奇吞食这个“诱饵”、上这个“套”是必然的；因为派工作组这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变了，刘少奇没有理解。而在这个问题上，陶铸是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曾志说：陶铸刚赴北京没几天，6月9日就飞杭州参加主席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主席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说：“我是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遣工作组，这是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参见《陶铸传》，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毛既然设这个“套”、放这个“诱饵”要整刘少奇，他能放过坚决支持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陶铸吗？这是明显的道理。1966年庆祝国庆节活动的报道时，陶铸要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见报，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他告诉新华社一定要设法有邓小平的镜头，于是就出现了所谓“换头术”的事情，即把邓小平的头移到别人（陈毅）的身体上。江青、陈伯达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确实符合事实。

对这件事即派工作组，也要做分析，派工作组的确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的工作组采用1957年“反右派”做法，在许多单位“反干扰”、“抓游鱼”等，把许多写大字报的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

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开始攻击我们的

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这件事情，陶铸恐怕是知道和参与了。

很显然，按照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的做法搞文化大革命，刘（邓）要负基本和主要负责，无疑陶铸也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这是毛在文革中提出来指导文革的基本概念之一。有人说它是一个伪命题，一点不假。刘少奇（邓小平）指导文革的思想、理论和策略，其实就是毛在十年前（即1957年5、6月开始）所提出和执行的“反右派”的一套。1957年毛理直气壮地把它称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什么在1966年文革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一时，彼一时”也。毛“与时俱进”，他的政治需要变了，斗争的主要对象转移了，十年前他反的主要是党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年后，他发动文革，反的不仅是党外更主要地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不明就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很不理解”），沿袭陈规，非但得不到毛的认可，反招毛更加不满。

## 二、在工厂和农村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陶铸和毛另一个大的分歧，就是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

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给毛写信并送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邓在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错。因此，他们送审通知草稿指出，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国家任务的特点。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各地原来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7月2日，毛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

陶铸在文革中坚决贯彻执行这个通知的精神。他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连续写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他这种做法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非难，说他用生产压革命。这可能也反映了毛的意见。

在要不要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问题上，陶铸的思想和行动同毛发生了尖锐冲突。

关于安亭事件。所谓安亭事件，就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等率领的赴北京告状的一千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安亭（上海辖区京沪线上的一个小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31多个小时的事件。王洪文等卧轨拦车，企图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

事件发生后，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做了两件事：一、电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二、致在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指出：“你们的这

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回沪处理此事。（按：周恩来和陶铸派张春桥去处理此事。）（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页）张春桥11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他在上海工人座谈会上别出心裁地说：“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13日晚，张春桥给陈伯达打电话：“工总司五条要求（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我不能不签字，也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不然车就不能通，他们不肯回上海。”张春桥认为可以签字就签了。（参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4页；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172页）

接着，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给陈伯达打电话，质问：“第一，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有没有权利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直接同工人组织签字，达成协议，反对华东局，上海市委？第二，张春桥眼里还有没有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政策？他是不是可以不顾国家法律、不顾党中央的政策，擅自达成违背法律、违背政策的协议？”陈伯达很为难，他只是劝陈丕显：“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已经签了字，怎么办理再研究。”陈丕显还跟陈伯达说他“也给陶铸报告了”。（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4—655页）

第二天，即14日，毛到钓鱼台召开常委扩大会，参加者有陶铸，文革小组和军队的几个人，但没有刘、邓、朱德、陈云。据王力回忆，毛一开始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这是针对陈丕显和陶铸的，他们说过工人不能成立全市性组织。这是支持张春桥。毛接着讲了认识论，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会上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都是检讨，陶铸也检讨。会后，我把会议结果电话告诉张春桥，他神气起来了。（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5页）

安亭事件之前，毛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认为光是学生不行。他要陈伯达起草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陈伯达和王力搞了一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这个《十二条》提出了工厂要搞文革，认为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革好得很，其中明白地写道：“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等，但在安亭事件后，这个《十二条》还是显得落后了。该《十二条》交周恩来、陶铸指示余秋里、谷牧召开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谈了二十天，却普遍认为《十二条》“左”，他们说《十二条》总的精神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和这种基础上，座谈会《十二条》进行了大量修改，实际上基本否定了，他们又搞了与之相对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对这个《十五条》，周恩来和直接指导座谈会的陶铸是很赞同的。而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意。陈伯达把谷牧叫来，对他大发雷霆：“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的无完肤了！”（见《劫后长忆》第175页）毛泽东对谷牧等搞的《十五条》更不高兴，“叫他们重写”（《王力反思录》下，第661页）。毛叫陈伯达、王力搞了一个新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周恩来和陶铸并不是反对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但他们认为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骤，要“抓革命、促生产”，千万不能影响和妨碍生产——这是他们最担心的。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周恩来和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有明显和尖锐分歧。

毛指示林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座谈会问题。1966年12月4、5、6

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连续召开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工业十条》。在这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围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铸。

在12月6日会议上，对陶铸进行了严厉批判。王力等人指责和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陶铸作了检查。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陶铸还谈到他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十五条》的某些观点。他说，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他进而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林彪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在整个工交战线，刘邓的影响不但是50天的问题，而且整个17年都影响很大。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参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64—665页；《劫后长忆》第179页）

林彪讲话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传达了毛的意图。

12月9日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与此同时，中央文革还搞了一个《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这个文件12月15日由中央发布。这样，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就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中去了。

毛具有挑战和应战的性格，越是遇到阻力，越是要以更大的力量冲破阻力。十年文革史反复表明，不论是谁挑战文革，毛都绝对不容。他不断创造和提出新概念，花样和手段也经常翻新。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厂和农村，毛在1966年12月26日特地举办了一次生日家宴。被邀参加的有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也在场），而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在家宴上，毛讲了一大篇话，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93—695页）吃饭时，毛举杯祝酒：“为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全国全面内战”，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一个新概念；文革后，关锋告诉我，在毛生日家宴上听到他这样讲，都怔住了，觉得很不好理解。

关锋和王力根据毛生日家宴讲话精神起草了《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把毛说的“全国全面内战”修正成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起了开辟文化大革命新阶段作用的元旦社论，无疑也是经过毛审阅的。

人们看到，毛这次生日家宴简直比一次中央会议还重要！就是在这里，毛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评说道：“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见第14

62页)这确实是毛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一次突出表现。

此时,即到1966年12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半年多了。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党政机关和文教部门进行。毛所以要提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是要突破这个范围,向工矿企业和农村更广阔的领域推进,即“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林彪语)。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希望的“天下大乱”。说得文明点,就是所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元旦社论的号召,针对性很强。社论说:“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这两段话,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的放矢。那是指何人?当然是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抵触情绪的从上到下的广大的各级领导干部,具体和直接针对的,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还没有被公开宣布打倒的陶铸。据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回忆,毛说:“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96—697页)王力还说:“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指示,在毛主席看来就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如果停留在学生和文化团体中搞,就要半途而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和根子就挖不深,反修防修、防复辟就解决不了。他认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就是这个问题。加上这时各省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是有人抵制文化大革命,是两条路线斗争在继续。他认为错误路线的代表是陶铸。因此,他对陶铸的问题抓得很紧,把它作为中心。”(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84—685页)

### 三、谁是打倒陶铸的决策者?

有人说:“陶铸是受江青等人的陷害被打倒的,毛偏信了江青等对他的诬陷……”我认为,在打倒陶铸中,江青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干将和急先锋,但她不是决策者。

按照曾志的说法,从1967年1月4日起,“打倒陶铸”的传单四处散发,满脑子装满了文化大革命、视文化大革命为命根子的毛三、四天都不知道吗?请看,他1月8日对陶铸的说法。这天,毛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 not 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是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见《大动乱的年代》,第154—155页)据王力回忆:“我记得毛主席还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8页)——这不是说明毛要打倒陶铸吗?这不是他公开批准陈伯达、江青等1月4日的行动吗?能够说打倒陶铸不是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历史常有小插曲。对毛关于陶铸的这个讲话也是如此。陶铸夫人曾志看到毛这个讲话,说:“我不相信主席说陶铸不老实,是不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了一个‘?’。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见《陶铸传》第370—371页)毛泽东在“不老实”下面画一横杠,并打上一个“?”,这是什么意思?非常难解。其玄机,高深莫测!这是不是毛反问曾志:“……你说呢?”居然还把这封信退给曾志,这使本人作何感想?曾志和毛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在这里,毛是不是做得太绝了!

顺便说一下,对这个问题,亲自参加在毛那里开会的王力证明:“我记得(毛)说很不老实……曾志回忆说毛主席不会说陶铸不老实,可能是说‘不老成’……”(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8页)和曾志不同,她女儿陶斯亮2012年4月3日给我的信中认可毛说陶铸“不老实”,她说:“……在给陶铸罗织的所有罪名中,只有一条是不冤枉他的,那就是‘形左实右’。这点毛已有看法,而文革证实了陶铸的确是‘不老实’,不可靠的。”

我们还是撇开这个小插曲,着重谈谈毛对打倒陶铸的态度。

陶铸究竟是谁打倒的?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一个人即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最早公开说并形诸文字:陶铸是毛主席打倒的。他说:“直到现在(他的书是2001年出版的),谷牧的回忆录中,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好像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他们到现在还认为陶铸不是毛主席打倒的,曾志也这样说。”(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8页;所说“谷牧回忆录”显然不是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谷牧回忆录》,可能是2000年前发表的单篇文章;就是在《谷牧回忆录》中讲的仍然是“好像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见该书第218页)

我认为,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应该承认和确认王力(他是打倒陶铸的当事人和亲历者,也正是在打倒陶铸之后,他成为宣传口的总管)的说法完全符合事实。这符合事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陶铸确实是毛打倒的,这是历史的真相;因为除了毛,没有人(如林彪、周恩来)要打倒陶铸,也没有人能够打倒陶铸。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过这样的话:打倒刘邓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当然包括陶铸了)那是毛的决定,莫说我们(指他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也不是说了算的。我看吴法宪说的也是真话和实话。所谓符合事实,再就是,连睿智智慧的老革命家而又心知肚明的陶铸夫人曾志都不说、都不点出这一点,即不指明打倒陶铸的真相,遑论他人——这恐怕就是党文化和党的教育以及党的纪律和党的某需要所使然的了。可悲,也无奈!

王力说:1967年1月4日,“江青叫陈伯达把陶铸问题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不是突然的,而这个公开宣布是突然的。”陈伯达在这天接见湖北省揪王任重代表团的会上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联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又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他在北京接见你们(指12月30日的接见)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革小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小组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独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陈伯达说你们揭露陶铸,揭得很好,这是给我们的支持。”(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7—678页;又见叶永烈《陈伯达传》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8—519页)

实话实说,陶铸并不是到1967年1月4日才打倒的,他在1966年的12月中下旬已经靠边站了,甚至政治局常委开会都没有他了。王力说:“一九六六年底,十二月份,剩下的常委(指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就是这种状况。此外,刘、邓已经不能容忍了,陶铸也不能容忍,在毛主席心目中陶铸和彭真一样。”王力还说:“陶铸问题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公开地打倒陶铸,发生在这一天,即1月4日。但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呢?不违背,也是他的意见……”(见《王力反思录》下,第711、714、778页)

如前所说,毛在1月8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是实际批准了陈伯达、江青1月4日所采取的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的。而到2月10日,毛的说法又变了。他在这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

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事就是你们二人搞的。毛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一个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可是毛又说，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九十九是对的，……不能拆你们的台。谁反对你们，我要反对他。（见《大动乱的年代》，第155页；该书把2月10日误为2月6日）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毛不同意陈伯达、江青公开打倒陶铸的根据。这样说，显然不能服人。请看，毛这天的说法有一丝一毫不同意打倒陶铸的意思吗？我看没有。如果有，毛为什么不叫陶铸以他原来的地位和职务继续工作？当时，毛乾纲独断，他的话，可是“一言九鼎”，用林彪的话说：“一句顶一万句”。不错，毛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这个指责是一个假命题。不论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讲，还是从实际讲，一个“五号人物”打倒“四号人物”都是不可能的。就从毛这天的谈话中也明白地表现出这一点。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一个名列第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这是毛亲自任命的），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犯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绝大错误？可是毛说：“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九十九是对的，不能拆你们的台。谁反对你们，我要反对他”，他这个说法不可用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我看毛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打倒陶铸问题上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一的错是什么？可能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时间和方式上，或许有不妥，即有毛不满意的地方。

照我看，打倒陶铸的过程和情况，大致说来，就是这样。

毛在打倒彭真时曾大言不惭地说过，打倒刘少奇时也大言不惭地说过（大意）：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动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晚年在中国共产党内确有这样的地位和权威——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皇帝的地位和权威。证明这点，打倒陶铸也是实例。擢升陶铸，打倒陶铸，都是毛一句话。陶铸这样一位高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经过任何正式的中央会议，也没有下达中央文件，就蛮横地被打倒了。从1967年2月10日，毛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批评”陈伯达、江青起，一直到陶铸1969年11月30日被迫害致死，他没有再说过什么话。这表明陶铸在毛心里和眼里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了。

□ 原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

【读书笔记】

知青——自我安慰的“青春无悔”

• 谢轶群 •

知青离我很远，那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浩荡展开之际，我还未出生；而当知青掀起大返城浪潮、这特殊的一页被历史翻过，我也还是学语孩童。知青又离我很近，在童年的记忆里，家乡的县城街头还有不少“知青商店”，小学老师里有定居在县城未返回的知青，工作后同事里多人有知青经历。更重要的是，我的父亲就是一位老三届知青，务农十年，终于等到恢复高考，于1978年考入大学。

之所以想起知青这个话题，是因为手边这本邓贤著《中国知青梦》。这本出版于1993年、重印于2003年的长篇纪实文学以丰富详尽的资料、细致深入的描写展现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始末。曾在云南当过7年知青的作者为写这本书行程3000公里，亲至25个知青农场，查阅大量文书档案，采访了从各地各类知青到省市领导的许多当事人，以饱含感情的笔触为这场历时十余年、涉及千家万户、改变共和国社会历史轨迹的运动留下了一份珍贵文献。读罢该

书，一股一言难尽的复杂况味久久充溢心头。

—

不管是知青自己，还是旁观者，都把知青称为受苦受难的一群人、一代人，他们高中或者初中毕业，正是学习知识的黄金阶段，却被抛出校门和城市，到农村“战天斗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远离日夜思念的亲人，也远离本应属于他们的知识文化。当西方国家的年轻人正投身计算机引发的科技革命之际，2000万中国知青却在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从事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凡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及其家庭都有一段辛酸的记忆乃至终身遗憾。

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参与或卷入这场明显伤害他们权益的运动？我想肯定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主动者有三种：一是充满理想和激情，真诚地响应上面号召，准备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的；二是家庭出身不好，希望以积极下乡的“觉悟高”表现换回政治地位和其他应有利益的；三是家里太穷，离家下乡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这三种人有主动性、目的性，但后两种其实也是被迫，到农村落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我们来看看出于“革命理想”的那批人。许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理想”和“激情”还被新一代人崇敬和向往。可是，他们的那种高昂状态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知青梦》里写到了第一批主动要求支援边疆的北京知青，因人数是55人，故以“北京五十五”的名号闻名云南全省。这批人在西双版纳安家以后，一个女知青在日记里写道：“一想到今天我们开荒种地住草房是为了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我就感到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个男知青在家信中这样说：“队长告诉我们，帝修反卡我们的脖子，一两橡胶籽的价格相当于一两黄金。我们要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我决心为种好反帝胶贡献我的全部热血和青春。”

看着这些庄严铿锵的字句，今天我们只会哑然失笑：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修反”什么时候以“一两橡胶籽一两黄金”的价格向中国出售过？他们的所谓“理想”、所谓“激情”、所谓“沸腾的热血”，不过是少不更事者上当受骗的产物！

在全国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约2000万知青中，主动参与的肯定是少数，大多数人是被动的。试问：谁不愿意读书，而要去种田呢？谁不愿呆在城市，而要去农村呢？《中国知青梦》没有多写这项政策是如何执行下去的，但另一位也有知青经历的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其一篇散文里留下了历史的真实。史铁生对后生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们知青下乡是自愿的，“您可一个字也别信”，他描绘了一位作动员知青下乡工作颇有“心得”的干部来他们学校动员时的情景：学生对上山下乡抵触畏惧、议论纷纷，该干部上主席台后第一句话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党中央的路线方针，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顿时会场鸦雀无声；第二句话是：“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这就是“动员”，这就是“工作方法”，纯粹是地痞无赖式的恐吓加逼迫！强权高压下，列车汽笛一响，泪雨滂沱，2000万知青弃学离家，散落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山野田原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政策到底是何目的，今天已可看得很清楚。知青下放大规模展开于1968年，文革已历两年，发动者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作为“文革急先锋”的“红卫兵小将”已失去利用价值，而他们被煽动起来的高昂“革命热情”又使他们成为一股不好控制的力量，必须使他们转向，把他们的劲头用“战天斗地”、“大有作为”、“支援边疆”等堂皇口号引向农村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已尝到了“无法无天”的甜头，还得抑制其太盛的气焰，便又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降低他们的地位，便于管控。另外，文革开

始后经济急遽衰退，城市已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人口，上山下乡的另一目的就是把大批城市青年赶出去，减轻城市经济压力。当时的一个口号是“不在城里吃闲饭”，已经泄露天机。

也许当时浑然不觉，若干年后知青明白过来后不知是何心情：狂热地参与了一场运动，又立即被这场运动抛弃，一腔热血只是做了工具，用完即抛，人生苦难从此开始。

二

在《中国知青梦》一书中，对知青艰苦劳动的描述倒不一定格外醒目，因为让城市学生去从事农业体力劳动，其不适应可想而知。最叫人触目惊心的，是以落户在生产建设兵团为主的知青所受到的管制和欺凌。这些以前在社会上也有所流传，比如我的家乡就传说有一个公社干部借批准知青回城的权力逼迫两个女知青和他一起洗澡，然而更多事情毕竟不为人所知。在书中，邓贤整页整页地大量引用最可靠的官方文书档案，让那血腥、肮脏、恐怖的一幕幕重见天日。

“（第十八团）排以上干部亲自动手四十八人，被打知青一百一十人，遭受三十几种刑罚，有的被打致残，有的内伤严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杀（未死）……”

“辽宁省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三千四百多起，四川省三千二百九十六起……河北省，仅一九七二年奸污案一百一十九起。”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六十九起，仅一师批斗知青七百二十七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云南省知青办揭露：据不完全统计……有一百零三名干部奸污女知青。”

“第十六团五营三连连长陈忠友，有妇之夫，奸污、调戏女知青十一人，女知青上山割胶，听见树叶响都以为是连长来了……”

“四川南充军分区副参谋长袁候新，在地区革委会任生产组长时，以安排知青工作为名，奸污女知青达九十余人。”

“祝江就，浙江省江山县丰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用各种手段奸污女知青八人，猥亵八人……”

……

在这密密麻麻的罪恶记录里，我还发现一个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离谱的案例：“第十团司令部参谋刀世美（正连级），有妇之夫，采用欺骗、引诱和胁迫等手段，鸡奸男知青二十余人”！

邓贤还采访了一个当年因犯“男女问题”而受处理的退伍军官黄万全。已53岁的黄万全竟然说：“这种事，不大说得清楚是谁的错……据我所知，干那种事，多数是女方主动，因为他们有求于你：入党，提干，上大学，病退，回城，等等。甚至有的女知青为了批探亲假就跟人睡觉……”他还感慨：“谁叫咱们那时候革命意志薄弱，经不起腐蚀呢？”

为了批一个探亲假之类，就要付出肉体 and 廉耻的沉重代价！掌权者还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可耻的罪犯！

如果这只是犯罪者强词夺理的狡辩倒也罢了，我特别不明白的是，邓贤到底出于何种考虑，用了不短的篇幅来“辩证分析”，以这些人在其他方面的“良好表现”来证明这些罪行“远非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思想作风等原因所致”，而是“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包括被李先念点名枪毙、恶贯满盈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独立一营教导员蒋小山等人，“如果没有那种权力绝对集中和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要是我们社会的法制建设再健全一些，对个人权力的监督

和约束再强有力一些”，他们也是“好好的同志”！读到这里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为什么不不说他们原本就是坏人，只是未得势的时候其真实思想品质没有表现出来呢？！坏制度下好人会变成坏人，坏人只会变成魔鬼。“老子窝囊了二十年，X他妈！今天轮到老子舒坦舒坦了。”强奸女知青20余人、猥亵侮辱女知青上百人、捆绑毒打男知青70余人（多人致残）的蒋小山的这句心里话，不就是大明大白的自证吗？任何行为当然都有其发生的客观条件，如果据此就可以把滔天罪行都推到“时代”和“体制”上去，那人间还有正邪、善恶和黑白的界限吗？！

震天响的“革命口号”之下，禁欲主义的社会氛围之中，红色潮流席卷的中华大地，人间罪恶一样不少。今天向往那个时代“理想”、“激情”、“廉洁”的年轻一代，看了以上关于知青生活的列述，该做何感想？我要说，尽管今天的社会现实中还有很多令人不满甚至愤怒的方面，但比起那个时代，我们的确进步了很多，改革开放刷新了中国面貌，推动了中国的文明进程。因对现实不满，一些人——而且多是有些年岁的人——开出的药方竟是回到过去，不知是何脑筋。

《中国知青梦》中还记叙了知青生活中大量可怕的故事，有夜间失火把十位平均年龄不到十七岁的女知青烧成一堆焦炭的，有一场台风过后海面浮起数百具保护拦海大堤的知青尸体的，有一次草原失火烧死知青六十九名的，有不懂炮弹知识而去排除哑炮而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有女知青生孩子时庸医醉酒而致母子双亡的，有扛毛竹下山被弹到山涧里摔成一堆“零件”的，有开荒误触蜂窝而被蛰得通体肿胀而死的，有雨夜出门上厕所失踪至今尸骨无寻的……史实历历，不堪回首。

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年的知青不少已人到中年，已进踏入成熟人生的他们开始回望和纪念自己的青春，这时知青界的一个口号、或曰一种态度掀起了一场波澜——那就是“青春无悔”。

1991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了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引起轰动。“青春无悔”就是这次回顾展的主题。

“青春无悔”由部分知青提出，又受到另一部分知青、社会名人以及年轻一代的猛烈批评。当时我父亲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说：“青春无悔？这些人有病！”年长他们一辈的著名作家张贤亮表示不可理解：离开了家庭，荒废了学业，到农村滚一身泥，再一无所有地回城，竟然宣称“青春无悔”？观看展览的一个研究生说得更为犀利：如果无悔，你们干吗回城？既然回城，为什么又要喋喋不休地说“无悔”？这次展览中，在“青春无悔”的总标题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一位俄罗斯诗人说过，一切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邓贤在《中国知青梦》里对此也予以有力质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

提出“青春无悔”者也许在新时期以后事业发达，因而感谢知青经历锻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了解了国情和社会。可是，今天的成功跟知青生涯真的有因果关系吗？知青人数达2000万，发达者又有几人？多数本应有所作为的人还不是被下放毁去理想，成为为生计无奈奔波的底层一员吗？也许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青春有刻骨的感情，不愿承认自己的美好年华成为了特殊时代的牺牲品——无论如何我们年轻时也在祖国大地上挥洒了汗水！可是，你又能说自己的青春有何价值？西双版纳知青付出十年辛劳，以血汗在边疆开辟出大片橡胶林，要打破“北纬20度以北不能种橡胶”的“神话”，结果80年代以来，他们种下的橡胶树已死亡90%，

有些农场的死亡率是100%！还有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的“壮举”，美好的青春事业献给了违背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荒唐举动，这究竟是建设者还是破坏者？如此青春，竟然无悔，你们到底是怎样的精神向度和价值取向？

这些话也许太过残酷。对“青春无悔”的最佳阐释，是我在网上读到的一首诗，作者是署名张愚若、张谷若的两位知青。这首诗是作者参观崇明岛上东平森林公园里知青立下的“青春无悔”纪念碑后所作，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们说青春无悔
是因为无可奈何
要自我安慰

这才是“青春无悔”四字的真正内涵！回首知青岁月，说青春无悔，他们哪里是欣慰充实，哪里是心满意足，而是在舔舐自己的伤痕啊！作为幸运地能够选择自己命运的一代，让我们为这些长辈献上一份真诚的理解吧！

四

知青是不幸的，但不是最不幸的，至少他们还拥有社会的同情怜悯，而且他们最终也都脱离了农村的体力劳动和单调困乏的环境，不管此后生活有多不如意，毕竟不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了。最底层的是农民，在很多地方，他们依然过着知青当年不顾一切要摆脱的那种生活。因为知青的人生和命运曾经在一个阶段和农民重叠，二者比较，也成为引起很多人思考的问题。

1980年代，“知青文学”兴盛，涌现出梁晓声、王安忆、叶辛、阿城等一大批知青作家。就在人们交口称赞他们的才华，夸他们“知青的苦没白吃”之时，出身农村的贾平凹淡然、简洁而富有震撼力地指出：“知青吃了一点苦，所以写了很多东西；农民吃了很多苦，所以什么也没写出来。”的确，知青出生在城里，被赶到农村过了几年十几年农民生活，就是时代荒谬、社会不公，可以用文学作品反复诉说苦难并获得同情和尊敬；农民生在农村，过那样的生活是一辈子，是祖祖辈辈，他们的诉说有谁去听？难道农民就是活该吗？

《中国知青梦》中最感人的一节是知青在70年代末为取得回城权利而做的殊死抗争，下面的情节曾被多家报刊转载：当时知青为回城的请愿活动风起云涌，国家派农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鲁田前去安抚。对话会上，鲁田坚持“不得返城”的当时政策，而知青不顾一切坚决要回城，双方僵持不下。这时一位瘦弱的成都女知青缓步走向土搭的主席台，正要开口说话，却双膝一软，扑通跪倒在鲁田面前，声泪俱下地哭求：“伯伯，好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可怜的女儿！”顿时三万知青一齐跪倒，撕心裂肺的哀鸣响彻长空大地。鲁田也为之泪流满面，此事对推动知青回城起了很大作用。读到这里我感动不已，但过后不禁又想到：知青受不了农村生活可以请愿，可农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向谁哭求去？有哪个“好伯伯”会来“救救”农民呢？答案就是那个冰冷而又雄辩的“谁叫你生在了农村”吗？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因出身不同，命运差别竟如此之大，这是一个文明国家吗？把这种差别看成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这又能算现代国民吗？

《中国知青梦》一书是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知青的，把知青放在受难者的定位上。作者是知青，是文化人，也是城里人，这三个视角下的知青都是受难者，是可怜人。而这三个视角之外，还有一个观照角度，那就是农民。从一些资料来看，农民对知青虽然首先也是同情，但他们的感触要多得多。知青下乡，一些农民敏锐地感到这是“和我们争口粮来了”，当时城市经

济衰退，农村难道就好？肩膊稚嫩的城市中学生来到农村不但不能增加生产力，反而加重了农民负担。知青说起来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他们给农民带来的礼物是让农民可能又多一个新罪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部分知青在农村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农村人根本惹之不起。籍贯安徽望江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一文里对此有生动描述和深刻分析。

中国城乡阶层之间隔阂很多，如果几千万城市知青的下乡，增进了这两大社会板块间的沟通 and 理解，倒也不失为幸事，可结果如何？虽然也见到过知青回访当年插队落户地的感人场面，以及知青与农民结下的情谊，但总体上，这场历时十余年、涉及几千万人的城市“移民”运动在弥合中国城乡间的鸿沟、增进阶层交流上没有发挥作用，在社会心理上，这依然是两个界限分明的世界。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回忆起当年一伙四川知青偷走一个农民的卖猪钱，致使该农民上吊自杀身亡，而多少年后这伙知青居然是用津津乐道的口气笑谈这件事！徐友渔感慨地指出：他们根本没有把农民当人，当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案例是极端的，但反映出的现象却是普遍的一一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达几年十几年，也并没有让城乡两个人群的感情苦乐相通，融合一体。在知青文学中，以及知青对农村的回忆文章里，当年知青们也常赞美农村风光，回味田园生活，同情农民疾苦，但那只是重新进入了城市壁垒的“城市贵族的乡村遥望”……

五

作为历史的一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被永远翻过，知青这个名词在今天也已经显出历史沧桑感。但这个历史名词承载的故事叙说不完，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悟也无穷无尽。看到我们在对他们认真地论说指点，头发已开始斑白的知青们会投来一个约略含笑的目光，说：对，知青，一言难尽。

□ 原载《人民网》文史频道

~~~~~

【文艺评论】

赞美苦难是一种虚妄

• 景凯旋 •

电视剧《知青》在央视播放后，引起许多年轻人的兴趣，同时也引来了许多当年知青的质疑，认为这部剧的许多情节和细节不真实，美化了当时的生活，有人甚至对编剧说出“我们还活着”的激奋言辞。

这部剧采用全景式的视角，通过几个知青的劳动与爱情生活，将黑龙江建设兵团、内蒙古建设兵团、陕北农村和山东渔村串在一起，因此它叙述的不是个人记忆，而是集体记忆。同一时代的个人记忆是有差异的，但集体记忆却与整个时代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点上，这部剧表现出的记忆成为遗忘的另一种形式。

更深刻地说，对“真实”的质疑涉及到对那个时代的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影视作品就已描写过知青的经历，这也包括编剧者本人在内。然而，三十多年过去，编剧对这段沉重的历史似乎没有任何新的认识，仍然将它置于人民与“四人帮”斗争的框架下，在艰难的诗意中表现革命理想主义。编剧想要在苦难记忆中“传递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农民全是纯朴善良，知青全是战友情深，只有两三个极左人物，还受到所有人的抵制。

在编剧看来，这段沉重的历史已经一去不返，其意义只在革命、青春与爱情，于是就像昆德拉所说：“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我们能去谴责吗？橘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清，哪怕是断头台。”剧中那茫茫的雪原、逶迤的山岭、辽阔的田野、长长的边境，知青们挥汗劳动的场景，情侣们交换的眼色，带给观众的是一种浪漫的激情，而不是深切的反思，无怪有些未曾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会心向往之了。

这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蒙昧。无论个别知青今天是怎样怀旧，都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即知青史属于“文革”史的一部分。除了疯狂与荒诞，这里谈不上任何积极的价值。认识这段历史，人们必须思考：知青给农村带去了什么？知青生活又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如果像电视剧所表现的，知青给农村带去了文化和脱贫的思路，这是对历史的美化。农村贫困面貌的改变恰恰是由于“文革”的结束，同时也是知青运动的结束。至于知青生活是否浪漫，人们应当还记得1979年知青大返城，许多下乡知青跪在各级官员面前苦苦哀求的情景。

在对知青的记忆中，“艰难玉成”是最为扭曲的。这种认识违背生活的目的，与人的常识相抵触。事实上，大多数知青因为上山下乡而失去了求学、就业机会，好不容易回城当了工人，很快又在改革大潮中下岗，如今他们已步入老年，靠着微薄的社保生活。也许他们有许多怀旧，但青春在他们毕竟是一种被劫掠，这才是真实的原生态。

编剧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将知青史视为青春的成长历练，而不是社会的自我摧毁，所以他才想表现“一大批单纯的年轻人怀着一种理想化的信念在生活、思考”。剧中描写了一位干部子弟在家信中对现实的思考，还有知青们悄悄读禁书，并在书页上写下“中国病了”的字句。这样的情节在现实中是有的，当年许多北京知青，尤其是一些干部子弟，很早就能读到内部出版的黄皮书，在思考方面走在所有知青的前面。这些知青中许多人后来登上高位，或者成为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高考制度恢复后，全国更有许多知青考上了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青春无悔”是因为个人的成功，但即便如此，所谓“艰难玉成”也是一种不公平的认识。知青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成功而设置的上天考验，千百万知青更不是为了他们的成功而付出的脚下垫背。如果编剧今天的思考仅仅源于这一体验，他们将会满足于等级秩序，而不是平等。

就像二十世纪初一位保加利亚诗人写下的寓言：一位年轻人看到人民的苦难，他不禁悲叹：“人民是多么不幸！”他决心帮助他们，但为此他必须向魔鬼行贿来登上顶端。他先是出卖了自己的耳朵，然后是眼睛，最后是记忆。当他登上顶端时，他听到人民的哀叹变成了欢呼，看到人民的裸体穿上了美丽的衣裳。他不禁赞叹：“人民是多么幸福！”

可实际上，许多基本的事物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他个人的处境。

□ 原载《南都周刊》2012-06-29

~~~~~

【宦海沉浮】

为何“打倒胡乔木”大字报却救了胡乔木

• 丁晓平 •

◇ 胡乔木被戴上十大罪状

“红卫兵”、“抄家”、“大字报”、“批斗”、“游街”……这真是一组可以进博物馆的词汇了！

或许21世纪的中国年轻人很难想象上面这些词汇背后的意义，更无从想象1966年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几乎都被这些词汇所包围。

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主任是刘少奇，副主任为康生、陈伯达和陶铸。在14名委员中，胡乔木荣幸地看到自己的名字还列在第7位。十天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撤职。但胡乔木还是很幸运地看到自己的名字，依然列在候补书记的位置上。

但这并没有令胡乔木欣慰多久，会议结束的第三天，也就是8月14日，“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找胡乔木谈话。严厉指出胡乔木从批判《清宫秘史》、起草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草稿）》，直至约请吴晗写《论海瑞》等等，都存在严重错误。8月15日，胡乔木不得不就以上问题写了一份表态性的检查。当天晚上，胡乔木在家中召集秘书、警卫等身边工作人员开会，郑重又坦诚地说：“我犯了错误。”

8月18日，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红卫兵们高举着“红宝书”，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8月28日，胡乔木将自己修改好的检查呈送给毛泽东。两天后，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这次，胡乔木还是非常幸运地接到了邀请，再次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9月5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停止对胡乔木发送文件。

9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专门听取胡乔木的检查，再次严厉批判胡乔木。对胡乔木的批判逐渐升级了！中南海里贴出了批判胡乔木的大字报，称他是“阎王殿中的阎王”。1966年12月25日夜，一群红卫兵高喊着“打倒胡乔木”的口号，闯进了胡乔木的家中，先将胡乔木和谷羽夫妇俩“看管”起来，然后开始抄家。

紧接着，一连串花样翻新名堂多多的批斗大会，让胡乔木失眠了，精神坏到了极点。随着批斗的不断升级，1967年1月5日至19日，胡乔木先后被六个单位的红卫兵批斗，或弯腰谢罪，或坐“喷气式”，或在寒风中游街示众，甚至被拳打脚踢……

胡乔木哭了！痛哭无泪！

一时间，批判胡乔木的大字报、传单贴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打倒胡乔木”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胡乔木被戴上了十大罪状——

- 一、恶毒攻击毛主席，极端仇恨毛泽东思想。
- 二、攻击“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
- 三、取消党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
- 四、吹捧刘少奇，充当刘、邓司令部的干将。
- 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 六、破坏对《清宫秘史》的批判。
- 七、为彭德怀喊冤申屈。
- 八、鼓吹“自由化”，宣扬超阶级的心理学。

九、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周恩来也救不了胡乔木

1967年2月1日早上8点，胡乔木就被中国科学院的造反派揪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从早晨8点一直站到下午3点，胡乔木才被宣布“押”上主席台，接受批斗。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来报告说：“不要斗胡乔木了，马上把他送回家。”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双脚麻木甚至精神都已经麻木的胡乔木，感到有些吃惊。事后，他才知道，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把电话打到了工人体育馆，明确指示：不准批斗胡乔木。

但好景不长，周恩来“不准批斗胡乔木”的电话“效力”20天后又失效了。

江青“四人帮”集团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地放过胡乔木？3月31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长文象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一样，公开地批判胡乔木、陆定一和周扬。文章发表在提前于3月31日出版的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上。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广播，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七八十个红卫兵立即在晚间闻风而动，来到胡乔木家门前一边高喊“打倒胡乔木”的口号，一边在墙壁上刷上了“打倒胡乔木”的大标语。

◇ “打倒胡乔木”标语吸引毛泽东驻足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北京邮电学院造反派在胡乔木家墙壁上刷的“打倒胡乔木”的这条标语，竟然奇迹般再次保护了胡乔木。这是怎么回事呢？

1967年5月1日，一个看起来很平常的日子。

这一天，一辆“吉斯”牌轿车经过南长街，向天安门驶去。然而，当“吉斯”行驶到南长街123号附近的时候，突然急刹车，停在了那里。不一会儿，从轿车里走出来的一个男同志直接向123号住宅走去，并敲响了大院的东门。可咚咚咚的敲门声，并没有得到住宅内的任何回应。敲门人只好返回。这时，他却发现自己乘坐的“吉斯”已经被群众团团围住，而且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人们兴奋地传递着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是的，此时此刻毛泽东就坐在这辆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吉斯”牌轿车里面。而下车敲门的就是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眼看着热情围观的群众实在太多了，毛泽东吩咐赶紧开车。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在这里停车呢？原来，这得“感谢”北京邮电学院造反派在胡乔木家墙壁上刷的“打倒胡乔木”的这条标语了。坐在轿车里的毛泽东无意中看到了这条标语，就想起了胡乔木，就问张耀祠：“胡乔木怎么挨斗了？去看看！”毛泽东突然想见见胡乔木，于是就立即命令“停车”。

然而，又是阴差阳错，胡乔木居住的这座院子原来是一个外国使馆，有东边和北边两个大门。东边的大门是原使馆使用的，胡乔木一家搬来后一直都未启用，进出都是在北边的大门。而张耀祠下车后，敲响的正是东大门，自然也就没有人答理了，他也以为没人在家呢！

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还是由围观群众中认识胡乔木的人，迅速地告诉了胡家。胡乔木既感动，又遗憾！

尽管万般遗憾，但毛泽东意外的来访，对胡乔木来说无疑仍然是一个天大的喜讯，至少毛泽东心里还在惦记着他。

胡乔木赶紧致信毛泽东，一是说明门牌问题，更多的则是表达感谢。谁知，第二天中南海的警卫人员忽然来到了胡乔木家查看地形，并告诉胡乔木：毛主席说“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

这个消息实在令胡乔木兴奋得无法形容。他和谷羽赶紧把儿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叫来，一起把因抄家而搞得乱糟糟的房子认真地打扫一遍，重新放置沙发、桌椅，上上下下像过年一样等待着尊贵的客人——毛主席的到来。

◇ 未能见面的终生遗憾

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也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中等候毛泽东的到来……等着，等着，不见动静，或许是毛泽东实在太忙了？还是其他原因？等着，等着，一直等到晚上12点，才接到中南海的电话——毛主席不来了！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电话。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胡乔木有些百思不得其解，情绪低落。后来，胡乔木才知道，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来看他，是因为江青为此在家中和毛泽东大吵大闹了一番……

这次，毛泽东没有能践约，但还是捎话给胡乔木：“我心到了。”没能来看胡乔木，毛泽东说：“我不去心里不安啊！”周恩来知道后，就打招呼，以后谁也不准批斗胡乔木。胡乔木十分理解毛泽东的难处，在知道实情后说：“我心领了。”

毛泽东没来，但毛泽东要亲自去看胡乔木的消息依然很快传遍了北京城。即便是红卫兵、造反派，再也不敢去揪斗胡乔木了。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在今后如何处理胡乔木的问题上明确指出：“对胡乔木，‘中央文革’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的，可告是陈伯达同志。如不问，就算了。”

为了表达感恩之情，胡乔木再次致信毛泽东：如果主席无时间，我可以去看望主席。然而，这样的机会再也没有出现。直至毛泽东逝世的十年间，两人都没能再见上一面。

1968年5月6日，周扬专案组在审查报告中诬称胡乔木历史上“很可能被突击当了特务”，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江青在9月18日的一次讲话中诬陷胡乔木曾“被捕叛变”。但在毛泽东的关心下，离开政坛的胡乔木没有被撤销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直至1969年中共九大的时候，他才落选。但江青一直想打倒胡乔木，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专案组，辛辛苦苦地收集了胡乔木撰写的大量社论、评论文章，并整理成册，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翻阅后，说道：“胡乔木写得很不错嘛！”江青吃了一个“闭门羹”，不敢再吱声了。

□ 原载《文史参考》2012年第一期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